

■新作聚焦

杨遥长篇小说《太阳离弦》： 诚实地书写生活的复杂与丰盈

□贺绍俊

杨遥的小说创作个性鲜明,真正做到文如其人。他为人朴实,小说也呈现出质朴的风格,叙事最常使用白描手法,写得生动传神。不过他的创作不止于朴实,更兼具内秀的特质:内心蕴藏着丰厚的学识与情感,这种特质同样投射在小说叙述之中。内秀赋予他的白描充沛的意蕴,不再只是简单勾勒事物轮廓,而是笔墨饱满、蕴含深意。长篇小说新作《太阳离弦》便是一部融朴实与内秀于一体的小说。

承续乡土叙事的文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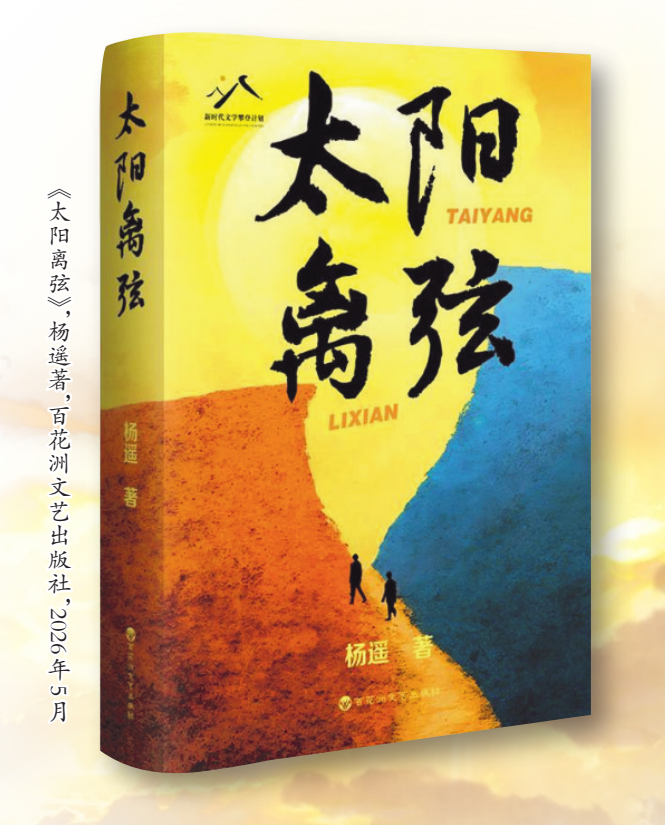
读《太阳离弦》时,我会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两部小说在题材和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写的都是农村青年如何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如何追求更美好的人生理想的实践过程。一个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写的是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两部作品均以扎实的写实笔法复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图景,深入描摹人物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尽管时间相隔不算久远,社会面貌、民众认知与思想观念却已发生巨大变迁。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存续,即城乡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两部小说的叙事根基,便建立于此。也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城乡命题仍会是作家持续审视、反复剖白、不断书写的文学母题。将《平凡的世界》与《太阳离弦》并置阅读,颇具意味。对照之下,我们既能窥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人心的变迁脉络,也能看到当代作家之间精神薪火在文学场域中的接续传递。在思想深度与艺术完成度上,《太阳离弦》并不逊色于《平凡的世界》。如今《平凡的世界》已是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在图书市场保持畅销;而《太阳离弦》尚待时间检验。我虽不敢断言它能拥有如《平凡的世界》一般持久的市场生命力,但作品内部承续着《平凡的世界》的精神内核——也就是植根中国乡土的现实主义。这种中国式现实主义,倘若作家把握得当,便足以经受时间淘洗。杨遥对此运用得恰到好处,我们有理由对《太阳离弦》寄予期待。

其实,从杨遥决定写这部小说起,他就将自己的创作与《平凡的世界》连接上了。他在后记里说:“我便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像《平凡的世界》那样,反映我们这代‘70后’,像我这样普通的人的奋斗历程。”小说的主人公赵小平,就是一个深受《平凡的世界》影响的文学爱好者。当赵小平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迷茫时,就会想起路遥。他一想到路遥40岁出头就写出了《平凡的世界》,就觉得自己不能消沉下去。后来,赵小平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作家。这个人物显然有杨遥自我的投射。从赵小平身上,可以看到杨遥对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敬佩之情。杨遥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的塑造都受其影响。他在后记开篇写道:“永远记得,1995年高考失利,捧着《平凡的世界》阅读,热泪盈眶的样子。那些挣扎与奋斗的故事对我的激励,远远大于家人和朋友的安慰。”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杨遥的文学创作延续了以路遥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文学传统。

“诚实的现实主义”

但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杨遥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路遥的后面,重复路遥的创作,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对现实主义乡土叙述作出有益的拓展和突破。

《平凡的世界》是一种规范的现实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是通过对生活艺术加工,将作者的理想观念融入 to 艺术形象之中。如孙少平这个人物,投射着路遥的主观理想。他既是底层的乡村青年,身上又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这种典型化的现实主义难免会同生活的真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在艺术加工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加进虚构和美化。杨遥更看重生活的真实和体验的真实,他对生活采取一种诚实的态度,不褒贬,不虚拟,也不美饰,诚实地书写他所感知的生活。因此,我更愿意把杨遥的现实主义称为一种“诚实的现实主义”。诚实,既是对生活的尊重,也是一种创作方法。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写作方法,“诚实的现实主义”更相信道理就存在于生活本身,诚实地表现生活,也就是要把生活本身蕴含的道理传达出来。这种创作手法,实质上构建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不求求廉价的乐观主义,也不贩卖苦难,而是在尊重生活的基础上发掘真实的力量,通过生活本身蕴含的道



理打动读者。杨遥特别看重细节。小说最打动人的就是大量的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的描写,这个时候就充分表现出杨遥所具有的强大的叙事能力。另外,从叙事角度看,路遥的写作延续了五四时期以来的启蒙叙事,这种叙事视角基本上是一种俯视的视角。但杨遥的写作是一种平视的视角,他在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时,没有道德优越感;但同时又清醒意识到自我就在现实之中,观察现实也是在观察自我、反思自我。因此,他的批判性显得特别真诚。也就是说,杨遥的写作并非延续曾经流行的新写实小说,不是零度情感和纯客观呈现,而是将真实作为原则的诚实,他的情感、价值立场和是非判断都包含在诚实里面。可以说,相对于路遥的启蒙叙事,杨遥采取的是一种对真实负责的写作方法。

真实,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乎奢侈的东西。AI技术帮助人们以虚拟代替真实,甚至可以达到假的比真的更真实的程度。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下,杨遥的“诚实的现实主义”就显得特别珍贵。

朴实与内秀的风格

杨遥的叙述基本采取白描手法,因为白描能有效地避开夸张、虚饰、滥情,从而呈现生活原貌。白描的手法也使得杨遥的写作有一种朴实的风格。朴实有可能会造成直白、浅陋和寡淡。但杨遥在朴实的风格里融入了一种内秀,这是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表达方式,是含蓄的、内蕴的,把自己的情感和对事物的评价,认知通过比兴、隐喻等方式寓于叙述之中。内秀的风格既体现在叙事技巧的匠心独运上,更渗透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

举例来说,小说第11章写赵小平的父亲得白血病后在医院治疗的过程,因为用上了一种试验期间的新药,父亲的病情竟然出现了好转。这一章节一直是沉重和压抑的,此处杨遥特意加上了一段纯粹描写景物的文字:

一场豪雨过后,花园到处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香味儿,有些花在大雨中凋谢了,更多的植物经受住了大雨的洗礼,碧绿的松树换上了新装,杨树、柳树叶子从鹅黄变成了深绿,丁香、迎春、樱花、玉兰、海棠、芍药、牡丹、洋槐、榆叶梅、山楂花、鸢尾、桃花、杏花、三色堇都竞相开放,连翘好像一下子长了一小截儿,蜜蜂也变得粗了一圈,蚯蚓爬到路面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这一段表面上看是关于景物的客观叙述,但通过上下文就能感受到这是赵小平的视角,通过他的眼睛,看雨后花园的

景色,看得那么仔细。只有一个心情彻底放松的人,才会把景色看得那么仔细,对花园里那么多花草充满兴趣。此处,杨遥想写的是赵小平在父亲病情好转后的心理状态,但他没有“正面强攻”,更没有采取抒情的方式,而是以含蓄的笔法写了一段景物描写,反衬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

想到理想,他忽然迟疑了: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赵小平坐起来,听见四周都是声音,病人的呻吟声,年轻母亲的喃喃声,情侣的情悄悄,流浪汉的呼噜声,招徕游客住旅馆的呐喊声……声音浪潮一样阵阵袭来,赵小平像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进。这种富有诗意的文字,没有背离整部小说“诚实的现实主义”叙述风格,却又因为诗化的处理避免了叙述的直接和单薄。

杨遥善于借助日常化的具象来隐喻抽象的精神内涵。比如,他写赵小平最爱听的歌曲是郑智化的《水手》,这支歌的反复出现隐喻着赵小平的不屈性格;写赵小平与赵振凯的友情,则是通过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赋予两人友情特殊的内涵;当写到赵振凯死亡时,并不渲染悲情,而是落笔在《沉默的大多数》,将个体死亡升华为对自由精神的追忆。作品常常通过留白的方式为读者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如写李明与孟春花的感情纠葛始终未从正面展开,仅仅通过《金水桥》唱段的反复出现暗示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

从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杨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吸纳与化用。他一方面承续现实主义的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借助隐喻体系拓展文本的美学边界。所谓“内秀”,不只是修辞层面的技法,更是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真正的现实主义力量,本就蕴藏于生活自身的丰富与复杂之中。因而,以诚实的书写呈现这种复杂性丰富性,正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历史烽火中淬炼的友谊是如此温暖动人 ——读徐锦庚《杜立特行动大救援》

□丁晓原

内外已出版有《东京上空三十秒》《轰炸东京》《降落中国:杜立特突袭东京》《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约》等。徐锦庚的写作取向和内容设置等,有别于此前相关的作品,包括了“杜立特行动”和中国军民对坠降飞行员的“大救援”等。全书共有17章。其中“从太平洋起飞”“中国战场的紧急准备”等5章书写“杜立特行动”的背景、筹划、准备,“1号机组:从临安到衢州”“七个幸运机组”“6号和16号:两个不幸机组”等9章,分别书写不同降落情形和地点机组“大救助”的故事。“从中国安全撤离”一章,叙述获救机组成员后续的经历和命运;“疯狂的报复”一章,写日本侵略者在浙赣等救援地的残酷行径和中国军民的奋起抗敌;最后一章“友谊地久天长”,是对“杜立特行动”近半个世纪后中美两国当事人和后代交流互动的纪实。作品所写空间地域广泛,时间跨越长达80多年,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众多,是对这一重大行动及其延长线故事最为完整而丰富的实录,由此也生成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实录价值。历史非虚构写作,对于历史题材进行“历史

化”的真实再现,是其价值实现的前提。这需要作者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想方设法走近历史、走进历史,通过历史当事人或关联人访谈、历史旧址寻访、史料搜集和研究著作研读等,对历史题材获得整体的了解和细部的认知,将散在的历史碎片有机地集纳“拼接”成完整的历史构图,进而修复历史、激活历史、再现历史。徐锦庚具有丰富的历史非虚构写作经验,深谙其中的创作之道。“历史学者提供专业指导,档案馆员检索尘封文书,当地居民分享珍贵记忆。”“有时为一个细节,要查阅十余份资料;为一个地名,要走访多个村庄。”他对采集来的史料,并不简单取用,而是进行仔细比对考证,去伪存真。正是选择了这样可靠的进入历史的路径,恪守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才确保作品的写作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历史基础之上。

阅读《杜立特行动大救援》,可以感受到作品不只是纸面上的历史书写,更是具有温度的“有我”之作。作者“出生在衢州,成长于宁波”,这两座城市,恰与一段用勇气和友谊书写的、不应被

■创作谈

我出生在农村,永远记得母亲在世时,谈起城里人时羡慕的样子。现在,农村人还在羡慕着城里人。

考取大学那年,我以为自己可以离开农村了。没想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滹沱河畔的一所小学,在复式班当老师。这个地方比我出生的地方还偏僻。我便拿起笔,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历经辗转,从乡村走到县城、市里,最终来到省城。工作迎难而上,每一步都从零开始,从小做起,不敢有丝毫懈怠,写作耗费心力,与老家的同学们联系渐渐少了。每当生活、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便感慨自己的起点太低。

2018年,我承担省里一项重要写作任务,回老家进行采访。采访结束后,晚上与同学们相聚。一副副曾经稚嫩的面孔布满沧桑,数十年的时光仿佛一下涌了过来。我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的他们那代人奋斗进城的故事,我要写我们这代人拼搏奋斗到城里去的故事。

有了这个念头,便一边构思,一边留心起同学们的消息,才发现以前主要关注自己,关注别人太少,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我们那届的高考状元,读的985大学,毕业后进入山西首家上市企业,一时春风得意。但企业经营出了问题,他2015年左右下岗,为了生计,辗转到横店和赣西找工作,却屡屡受挫。一度竟差点儿抑郁,还打算去北京开滴滴。还有一位在县里上班,用5万元炒股炒到200万元。那时我刚到太原,他报了太原一所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班,一来太原我们就聚会。他踌躇满志,对国家各种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一副成功人士模样,不想却遇到股市熔断,欠下一大笔钱。后来,他迷上考证,先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又考取了会计证。他说证件越多,身价越高。还有一位从单位跳槽出来,给太原的大企业供货,给县里的单位安装电脑、监控设施,炒楼盘,赚了不少钱,是同学中先富起来的一个。后来,他开了影楼,从德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计划在全国各地开连锁店,结果遇到智能手机普及、折戟沉沙,于是又开始做短视频、直播……有一天,他找到我,神秘地说:“伙计又转回老本行了,给企业供货。”我把这些内容慢慢整合起来,形成几个人物的形象,赵小平、李叶红、冯云、俞华、赵振凯、张思淼、苗霞……但光有这些人物的还不满足,我还想写另一类人,写马托邦的建造者。我想起在临汾、吕梁采访过的企业家。他们在世俗意义上更加成功,生活也更加波折。山西作为产煤大省,这里的一些煤老板确实见利忘义、黑心黑肺,但也有一些有情怀、有理想、讲道义,却一直没有被看见的人。

2022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学习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开头的那场舞会,让主要人物出场。我选择了录像厅。录像厅曾经是小城“70后”一代人的经典记忆。曾几何时,我们周末聚在昏暗、拥挤的录像厅,看香港的枪战片、警匪片,看那些令人面红心跳的爱情片。这让苍白的高中生活多了些别样的色彩,也让即将走上社会的小城青年学习了一些别处难以得来的知识。恰好,我们高考时,有几位同学承包了录像厅,我把这件事情写进小说。每个主要人物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了他们的基本性格。故事一帧帧展开,我努力贴着每一个人物写。我把自己想象成素描高手,精准描绘每一个人物真实的样貌;想象成心理分析师,精准掌握每一个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平凡,但能让自己的骄傲的就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奋斗。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在不同的岗位,也都非常努力。也许,这也是“70后”一代人的特点。但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成功,作品中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还受制于社会、政策、家庭,甚至偶然的因素。

为了真实,我建立了一个大事记,把1995年到2020年每年的十件大事都整理出来,作品中写到时,努力核实,力求准确。

在我生活过的农村,许多人说话嗓门特别大,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别人听到,但是听他们说话的人往往少得可怜,甚至连他们的爱人和子女经常都不听他们说话。我也经常说话,渐渐发现,发声是一种权利,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声音是传播不出去的。

我想起我的那些同学、朋友们,他们的歌、他们的泪、他们的理想,都需要被人听见。

开放,15个机组或坠毁或迫降?为什么说七个机组是“幸运”的,两个机组是“不幸”的?“杜立特行动”中的成员后来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作品的叙事悬念一个接着一个,引人入胜,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徐锦庚深知要讲好故事,需有生动的细节,否则读者就会失去阅读的兴趣。在《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中,作者或深挖历史细节,或根据历史场景和人物行为的逻辑,进行“小中见大”的“渲染”。许多细节留给读者很深的印象,将中国百姓的善良、勇敢和厚道,凸显得淋漓尽致。这些细节或壮烈或细微,笔墨或浓酣或淡逸。它们写实写活了人物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富有感染力地表达了作品的宏大主题。

《杜立特行动大救援》讲述的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中美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结下的生死友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今天的世界需要和平与发展,这种历史的、人民的友谊尤需发扬光大。(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评 论

历史烽火中淬炼的友谊是如此温暖动人 ——读徐锦庚《杜立特行动大救援》

□丁晓原

徐锦庚长篇新作《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是一部独特的国际题材历史非虚构作品。作品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中校杜立特率领航机组编队轰炸日本东京后因燃油耗尽,机组人员在中国境内跳伞或迫降,中国军民为此展开了一场生死大营救的故事。这部作品的主题词就是“友谊”。这种友谊在历史的烽火中淬炼而成,为守望正义与和平而缔结,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因而特别崇高,特别动人。它能跨越山海,穿过历史,天长地久。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民间的深厚友谊是人类命运方舟上的压舱石。《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不仅是“杜立特行动”的英勇传奇,是中国军民“大救援”的人道主义颂歌,也是中美两国人民血与火铸造的深情厚谊的实录,更是一份关于世界和平国际大主题的启示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本书背后的深意也在于此。

“杜立特行动”作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不少作家重要的写作题材,国